



五四运动中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

潘汝南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各校在全国率先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北洋大学召开会议,于方舟、韩致祥、安幸生等省一中学生代表参会,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收回山东主权。他们返校后,迅速向省一中各班班长传达北洋大学开会情况。于方舟发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铿锵誓言,号召同学们一致行动起来,投身打倒卖国贼,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的救国运动。省一中各班学生迅速响应,订立爱国公约,成立学生救国团,并推选于方舟为团长。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韩致祥被选为副会长,于方舟被选为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随后又被推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之一。至此,天津学生开展有组织的爱国宣传、罢课、声援工人罢工等系列活动,对推动天津五四运动走向高潮发挥了关键作用。

无所畏惧 唤醒同胞

此后,省一中进步学生组成演讲队,深入西北角、北门、东南角、东门里等地宣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号召民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演讲活动遭到军警阻挠,但队员们不畏强暴,坚持街头宣传。学生们的演讲慷慨激昂、催人警醒,在胜芳镇演讲后,不少听众潸然泪下,当地绅商纷纷捐款,支援学生救国运动。8月23日,于方舟在街头演讲时遭反动军警逮捕,被羁押半个月。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出狱后继续义无反顾地投身爱国运动。

6月5日,省一中学生参加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宣誓大会,庄严宣读“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等六项誓言。会后,学生们冲破军警阻拦举行游行,赴省公署请愿。随后,韩致祥等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10人赴京请愿。10月2日,天津12所学校4000余名学生赴省公署请愿,于方舟、韩致祥作为学生代表陈述爱国诉求。

1920年1月,省一中学生吴士昌与其他学校学生共7人,因检查账房成商号日货与警方发生冲突,前往警察厅交涉时遭殴打,吴士昌身受重伤并被拘留。1月29日,于方舟与周恩来等发动包括省一中在内的20余所学校千余名学生,赴省公署请愿,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释放被捕代表,遭到当局无理拒绝。学生们涌入省公署后,直隶省长曹锐出动大批军警血腥镇压,于方舟、周恩来等代表被捕,省一中多名学生受伤。在狱中,于方舟受尽折磨,但他毫不畏惧,顽强斗争,以诗明志:“千古做完人,震撼三津,爱国不怕进狱门。”青年学生的无畏抗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深刻影响了时代进程。

振聋发聩 传播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5月,省一中学生救国团编印出版《醒》报,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书》中写道:“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存亡绝续、千钧一发、危险到极点的时候啦!”高呼“同胞醒!同胞醒!”,号召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进行斗争。于方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发聋振聩》的演说词,呼吁同胞们振作救国精神,作拯救祖国的斗争。该报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主要刊载爱国运动新闻与宣传材料,深受民众欢迎,每期发行量由数百份增至五六千份。

1919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等20余名青年骨干组建觉悟社,邀请李大钊前来演讲,他告诫青年,“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并创办《觉悟》杂志。10月,于方舟、韩致祥联络安幸生、陈镜湖等人发起建立新生社,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学说。翌年4月,安幸生创办并主编《新生》杂志,该刊以介绍新思想为宗旨,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探讨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此后,于方舟在新生社的基础上组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表会刊,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革命主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指导下,觉悟社、新生社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互相支持、并肩战斗,成为天津学生运动与思想传播的核心力量,为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声保障 全力支持

在省一中教师的指导下,省一中新剧团编演新剧《爱国潮》,全剧12幕,分上下两集。剧情揭露卖国政府勾结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罪行,再现“火烧赵家楼”等爱国运动场景,生动展现了民众不屈的抗争精神。该剧先后在省一中礼堂、广东会馆、江苏会馆、平安影院连演30余场,情节真切、感染力强,场场座无虚



席。演出所得票款全部捐赠给学生联合会,作为各校救国团活动经费。

此外,在学生大规模罢课期间,恰逢毕业考试,因考试无法在校进行,教师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在老师家中完成考试,确保学生在投身爱国运动的同时顺利完成学业、领取毕业证书。省一中教师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

1919年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公开拒绝签署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五四运动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省一中以昂扬的爱国姿态与坚定的革命行动,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洪流,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阵地与骨干力量,为推动天津学生运动走向高潮、传播进步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五四运动的光辉史册上,永远铭刻着省一中师生的爱国壮举与历史贡献。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

近现代天津报刊中的话剧文献

侯娟

在近现代天津文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报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刊不仅是发表作品、开展批评的主要园地,还能成为某一思潮或社团、流派的旗帜,成为承载、塑造某一地域文化的阵地。特别是对天津这样一座在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史上均产生巨大影响的城市而言,报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报刊鲜明地体现出近现代天津城市文化的基本风貌和发展格局,成为其地域特征的重要载体。同时,天津又是中国话剧的重镇,对这一舶来的艺术门类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不仅中国最早的校园话剧演出之一——“南开新剧”诞生于天津,而且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张彭春、曹禺、焦菊隐、黄佐临等均出生于天津,并在天津开启了自己的话剧生涯。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求学于南开中学,也是“南开新剧”的积极参与者。近现代天津的报刊和话剧均成就卓著,报刊中的话剧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津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近现代报刊作为话剧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将天津乃至中国的话剧纳入文化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全过程,体现出话剧传播的原生态特征,成为考察近现代中国话剧史的有效切入点。对话剧艺术和天津城市文化建设而言,各类报刊是承载其特征和品格的主要载体,也是近现代天津的一个文化标志和品牌。而且以《大公报》《益世报》《北洋画报》和南开学校系列刊物等为代表的天津报刊,影响力不限于某一地域,而是辐射全国。因此,对近现代天津报刊中的话剧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有助于更为直观地呈现话剧艺术在天津、华北乃至全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有助于为天津城市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及其主要价值的全面估量,提供更为翔实的文献依据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纵观报刊类型,近现代天津报刊中的话剧文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报刊中的话剧文献

天津是北方左翼文化的重镇,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运动就在天津蓬勃开展。可以说,革命精神一直深植于天津近现代文化肌理之中。作为革命文化重要载体的革命报刊在天津层出不穷,其中《星星》《夜鹰》《南中学生》《当代文学》等报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话剧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宣传效用和艺术功能深受革命者的重视。在上述革命报刊中,刊载有众多话剧文献。其中,文艺期刊《当代文学》以篇幅规模宏大、办刊历时较久著称。该刊每一期都刊载话剧剧本,先后发表了凝秋的《狱》、韵心的《栈芽》、彭岛的《开演的时候》、今及的《锣声》、文殊的《国庆之夜》、陈明中的《星火》等作品,集中呈现了北方革命话剧的实绩,有力地宣传了革命文化精神。

二、校刊中的话剧文献

由严修先生、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在张伯苓、张彭春先生的主持下,开展校园话剧运动,使之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张彭春亲自撰写剧本,并实行导演制,使南开校园话剧在艺术和教育两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南开新剧”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篇章。先后在南开中学求学的周恩来和万家宝(曹禺),都是南开话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南开话剧运动的相关文

献,如剧本、剧照、档案、评论,以及相关活动的报道等,均收录于南开学校各类校刊之中,如《南开周刊》《南开初中生》《南开高中生》《南大周刊》《南大半月刊》《南开女中校刊》《南开校友》《人生与文学》等。

三、专业型文人报刊中的话剧文献

这里所谓的专业型文人报刊,是指从晚清书报议政风潮,到近代职业报人自主办报、摒弃商业逐利取向,以言论报国、公共济世为核心旨归的报刊。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便是此类报刊的杰出代表。无论是英敛之执掌时期,还是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始终秉持忘己无私、平实中正的办报宗旨,拒绝迎合市场的媚俗化倾向。张季鸾更是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准则。天津另一主流大报《益世报》,同样具备这一特质。

这类报刊登载了数量众多的话剧文献,内容涵盖新闻报道、演职员自述、访谈、剧评、剧照、剧目广告等。《大公报》《益世报》刊发此类内容,并非出于商业牟利的考量,其初衷一方面是基于报人记录时代的使命,为天津乃至全国的话剧活动留存史料;另一方面则是报人充分认识到话剧的社会教化价值,通过报道与评述,对话剧发展进行及时、正向的引导。

四、商业报刊中的话剧文献

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也拥有数量众多的商业性报刊。以《庸报》《北洋画报》等为代表的商业性报刊,虽以市场为导向、面向普通市民、注重发行,但文化品位端正,内容不失品质。这类报刊往往兼顾商业价值和他价值,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感虽略逊于专业型文人报刊,却也不容小觑。特别是由南开中学教师、进步作家姜公伟主编的《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对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颇多关注。该刊以大量篇幅介绍鲁迅、茅盾、萧伯纳、高尔基、卓别林等中外知名文学家和艺术家。话剧艺术也是该刊的重点关注对象,无论是中国旅行剧团等著名话剧团体,还是唐槐秋、熊佛西、曹禺、黄佐临等著名话剧人,其身影多次出现在《另外一页》中,得到了如实的报道和客观的评价。此外,画报是报刊中的独特类型,以《北洋画报》为代表的天津画报图文并茂,直观地彰显出话剧艺术的魅力,同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的报刊对话剧大师曹禺予以了格外的关注。曹禺是从天津走向世界的话剧艺术大师,其代表作《雷雨》《日出》一经发表,便先后被搬上舞台,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天津报刊不仅聚焦曹禺话剧在津演出情况,视野还延伸至上海及其他地区,成为记录曹禺话剧传播与演出的重要文獻。

对近现代天津报刊中的话剧文献进行系统考察,有助于完整呈现近现代中国话剧的艺术史、传播史、演出史、剧场史和文化史,也有助于凸显话剧艺术与天津城市文化的内在关联,阐释作为“津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话剧艺术的独特价值。

【作者简介: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本文为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津派文化研究专项“近现代天津报刊中的话剧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编号:TJJW-ZD10-02)阶段性成果】

清末天津县工务分会创建钩沉

杨莲霞 刘胤彤

1911年5月,天津召开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会议——天津县工务分会成立相关会议,这些会议关乎这座城市工业的未来,标志着中国北方工业力量从分散走向联合,也是清末“实业救国”思潮在天津结出的重要成果。

一、时代的呼唤

清末新政的推行,激发了华夏大地实业救国的热忱。在农工商部的积极推动下,一场自上而下的工业团体组建运动渐次铺开:各省纷纷设立工务总会(亦称工业总会),各府厅州县亦相继筹备工务分会(亦称工业分会)。当时这些尚未完全摆脱行帮属性的组织,被《大公报》《申报》等主流报刊称作“工会”,是近代工业团体的早期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商会”“农会”三足鼎立,既是“工界”振兴实业的中坚力量,也是“手艺人”抱团取暖的精神家园。

此时的中国工商业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下备受冲击。有识之士痛切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商战之时代也”。作为清末新政的前沿阵地,天津在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开拓之志、开放胸怀及独特工商文化气质的新型城市精英。为使天津成为“括全省工业之枢纽”,本着“研究一切工业以期挽回利权”的初心,他们率先组织工商研究总会及分会,筹建天津县工务分会。此举既是新型工商精英践行实业救国思想的创新探索,亦开清末县级行政区划设立工务分会之先河,在全国具有特殊意义。

二、前奏与孕育

天津县工务分会的诞生,有着清晰的政策依据与扎实的舆论铺垫。1909年4月,农工商部号召各省组织各类工业团体,潜心钻研工业技术改良之法;1911年4月中旬,农工商部再发公文,要求依据此前修订的工会简章宗旨拟定详细章程,并督促落实。天津工商研究会当月下旬便在工商研究总所内率先组建工务分会,以“研究工学,改良工业、拓增实际上之进步”为宗旨,成为全国范围内较早开展此类探索的团体,为后续工务分会的正式创建积累了宝贵经验。

1911年,天津县工务分会的筹建工作步入实质阶段。3月3日,《大公报》首次刊载《农工商部奏拟工务分会章程》,向社会释放设立工务分会的明确信号;5月2日至3日,该报又全文发布《农工商部奏定工务分会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农工商部为全国工业总会之枢纽,负责“于各省筹办工会”;各省工业组织“于各省省城应设总会,于各府厅州县应酌设分会”;总会设总理、协理各一人,分会设总理一人,均由工会董事投票公举。无论农工商部,还是各省工务总会、各府厅州县工务分会,均以“研究工学、改良工业、倡导工业、拓增实际上之进步”为共同宗旨。

与此同时,舆论宣传也为工务分会的筹建营造出热烈氛围。1911年4月25日,《大公报》以《组织工业会》为题介绍天津工界拟定创设工务分会之情形,以期形成“商界人商会,工界人工会”的格局。4月30日至5月5日出版的《大公报》连续六日刊登“设立工会广告”,公布天津工务分会筹备会召开时间与地点,邀请工界人士参会。5月5日,该报以白话文形式向工界承诺:“要是遇见被人欺负的事,全可以保护;遇见困难的事,全可以维持”,并盛赞成立天津县工务分会“实是一件最好的事……这个机会是吾们工艺里头的人,可遇不可求的”,言辞恳切,饱含期待。

三、筹备与成立

1911年5月7日晚八点,天津县工务分会筹备会在东马路宣讲所召开,由天津工商研究总会宋则久、李子鹤、纪管涔三位会长共同主持。宋则久首先登台,详细介绍了设立分会的背景与目的。李子鹤条分缕析了《农工商部奏定工务分会章程》,并对5月14日的工务分会选举作出具体安排。纪管涔深刻揭示了行业内恶性竞争的困境,又满怀期望地号召工界“自当联合团体,力求进步于后”,以抵制洋货、培育竞争意识,助力国家富强。

筹备会激发了工界人士的人人热情,报名者络绎不绝。5月8日,《北洋官报》发表《演说工会之利益》一文,向社会呼吁“天津要仿照商立一个工会……教工界的人全去题名”,邀请“手艺人跟带有手艺的铺子并公司、工厂”踊跃报名。5月8日至14日,《大公报》连续刊登以《天津工商研究总会谨启》为题的启事,提醒希望入会但尚未登记的人员及时补报。5月15日,《大公报》刊登题为《演说工会之利益》的文章,该文既分析了商战、兵战与强国的密切关系,又指出当时中国工业不振的根源在于“大家如同散沙一样,不仅不能联合,同行是冤家”,并提出“大家连成团体,一洗旧日的毛病,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团体,同行是冤家变成同行是好友,互相气恨改成互相照应”的期许。

1911年5月21日下午两点至六点半,天津县工务分会开箱唱票仪式在东马路宣讲所举行,现场“旁观者”达130余人,气氛热烈。最终得票较多者有宋则久、李子鹤、纪管涔、赵元礼、孙恩吉、刘辅臣、苑士林、刘文仲等人。其中,宋则久、李子鹤、纪管涔为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孙恩吉、刘辅臣、刘文仲为天津县工务分会会长;苑士林为天津竹工研究分会会长。这份名单清晰反映出天津县工务分会与天津工商研究总会及各专业分会之间的紧密关联。5月29日下午四点,天津县工务分会于工商研究总所召开成立大会,得票最高的宋则久当选为首届总理并发表就职演说。至此,天津县工务分会的组建与总理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四、续曲与回响

然而,新生的天津县工务分会很快遭遇严峻考验。1912年3月2日,“壬子兵变”爆发,天津工商业遭受重创。宋则久代表天津县工务分会上书袁世凯:“所遭焚掠者资财已空,无以重整”,道出了兵变后分会无力重整被焚掠之地、弥补资产损失的窘迫处境,恳请大总统体恤工商界的艰难处境,尽快颁布善后办法,酌情给予资本赔偿,使受灾的工商从业者“自得生机,重兴其业”。1914年,袁世凯下令取缔工务总会、工务分会等相关组织,天津县工务分会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天津县工务分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津县工务分会推动着清末民初的天津逐步发展成为北方的工业中心和通商大埠,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实业救国的初心,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一段值得铭记的篇章。

【作者分别为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为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津派文化研究专项“从‘实业救国’到‘实业报国’:近代天津工商文化精神传承与创新研究”(课题编号:TJJWZD05-01)阶段性成果】